



ANYUAN DABAGONG
QIANHOU

安源大罢工前后

张振初 刘家林 刘宗道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安源大罢工前后

张振初 刘家林 刘宗道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安源大罢工前后

张振初 刘家林 刘宗道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制厂印刷

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4,000 印张：2,527 印数：1—1,800

统一书号：11109·173 定价：0.22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3)
开办经过.....	(3)
一座人间地狱	(8)
有压迫就有反抗	(12)
揭开工人运动新的一页	(16)
第二章.....	(21)
罢工之前.....	(21)
英明的决策	(23)
屡挫敌人阴谋	(28)
会议室内的斗争	(35)
罢工取得全胜	(39)
第三章.....	(44)
打破包工制	(44)
治内援外	(48)

年关斗争.....	(53)
第四章.....	(57)
弯弓待发.....	(58)
巍然不动.....	(60)
六月风潮.....	(64)
反对“左”倾盲动	(66)
第五章.....	(71)
思想整顿.....	(71)
文化政治教育	(76)
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79)
加强工农联合 支持农民斗争	(81)
粉碎“三角联盟”	(84)
工人参加管理	(86)
第二次罢工	(89)
结束语.....	(94)

前　　言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之一。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这是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一次大的胜利罢工，在我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取得这次罢工胜利的主要原因，正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出的，是因为安源工人“万众一心的团结奋斗”，“工友能够服从统一的指挥，而为工友的指导者的，都是诚实帮助工人的社会主义者。”这次罢工历时五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中国工运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罢工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李立三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取得罢工胜利后不久，李立三即离开了安源，刘少奇继续领导安源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整顿工人的组织，巩固工人的阵地，支援外地工人的斗争，扩大了胜利成果。“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刘少奇把党的基本原则和安源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在白色恐怖中，不仅没有被摧垮，而且有所发展壮大，当时有“小莫斯科”之称。

因此，安源大罢工前后的三年，实际上也就是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三年。这是战斗的三年，大有功绩的三年。

本书引文均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一书中有关的文件、文章和报道，文中就不一一注明了。

第一章

安源，是我国江南储煤丰富的矿区之一，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县境内。距县城东南十三华里，就是闻名全国的安源矿区。这里，山岭重叠，林木丰茂，气势雄伟。远在一亿五千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后来海水消退，地壳上升，形成了陆相砂质岩含煤沉积。距今千多年，即七世纪的唐王朝时期，人们就发现这里煤藏丰富，说这里有二十四条乌龙，人们一年只能挖掉“乌龙”的一片鳞甲，挖掉后很快又长了起来。贫穷的安源人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个煤海里翻腾着……

开办经过

明末清初，安源土法采煤有了发展，据有关记载，当时开挖的土井就有二百六十多个。但这里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焦产区，则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前清的官僚买办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在这

里兴办机械开采工矿企业以后的事。

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了大冶铁矿；一八九六年，又派洋务买办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炼铁需要焦炭，起初只能向欧洲国家如德、美、比等国购运煤焦供应。因远途转运，价格昂贵，亟欲就近自行开采，以应急需。于是重金聘请英、德矿师郭师敦和赖伦，在长江一带调查勘探有无大量炼焦煤可供采用。一八九八年二月，他们作出安源的煤“周围九十余华里，蕴藏极富”的结论。三月，清廷批准张之洞、盛宣怀的稟奏，将安源划为使用机械开采的矿区。四月，“萍乡煤矿局”成立，清廷投资百万两，作为建矿资金，由盛宣怀的亲信张赞宸及德帝国主义分子赖伦经纪其事。他们吞并土井，划定矿界，霸占了整个矿区，然后着手凿井、开巷、修路、建厂，一个较大规模的机械开采矿区，就这样在安源出现了。

安源，从它建矿的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阶级手中的一块禁脔，特别是帝国主义，相继用贷款和提供技术人员等办法，进一步控制矿区，肆意压榨和掠夺矿区的财富。例如一八九九年，正在长江流域寻找侵略据点的德帝国主义看中了安源煤矿，授意“礼和洋行”出面，通过在安源握有实权的赖伦，同张之洞、盛宣怀签

订向安源贷款四百万马克的合同，规定其中三百万用于向德购买机器设备，一百万用于建矿工程。合同还规定要由赖伦任总工程师，其余生产部门的“矿师”、“监工”之类的职位，均要由德人充任。这样一来，整个矿区的生产管理大权，被赖伦等帝国主义分子全部把持了。一九〇一年，义和团运动波及安源时，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才席卷掠夺的资财仓惶逃去。

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经济势力迅速膨胀，急欲掠夺中国矿藏资源，尤其企图染指大冶铁矿和安源煤矿，为其扩张军国主义服务。一九〇四年，日本政府乘汉阳铁厂筹款困难，无法改炉之机，授意日本“兴业银行”，以预支矿价名义，向盛宣怀贷款三百万日元，规定以两百万给汉阳铁矿，一百万给安源煤矿，为日资渗入这些企业敲开了大门。一九〇五年五月，日本大仓组财团又两次向安源贷款，共二百万日元，年利七厘五，并指定以安源矿所有财产及焦煤作担保。一九〇七年，日本大仓喜八郎与安源订立了“售焦合同”，期限三年，计焦二万四千吨，以售价所得，作为偿付安源所借大仓组财团借款的本息。继德帝国主义一度控制之后，整个安源矿区的生产资料，又这样牢牢地拴在日本帝国主

义的战车之上，成为向日本军国主义提供大量焦炭资源的基地。

帝国主义对安源煤矿的控制，是通过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的相互勾结，构成三位一体的上层统治来实现的。因此，从建矿开始，整个矿区就被放在承担帝国主义债权的位置上，矿区的一切事务，都要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和摆布，听任它们来压榨和剥削。建矿初期所生产的财富，绝大部分流入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口袋里，而矿山的机械建设工程的进展却非常缓慢。直到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过九年的“经营”，前后耗费近五百万两白银的巨资后，才算初具“机矿”的规模，总计有煤井窿口七处，直井二处，西式炼焦炉三十六座，土焦炉二百余座，洗煤机二部，电机车一部，直井升降机三部，电厂、机器厂、化验室、煤砖机、制造厂、火砖厂各一座。全矿有德国矿师和监工三十四名，员司三百多名，工人三千六百多名，每昼夜出煤一千三百吨，炼焦六百吨。这就是安源建矿近十年的粗略情况。

安源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所产煤焦，只能靠小船装运，但冬干水涸，小船亦无法运出，乃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五年这段时间，先后分段修建株萍铁路，长达九十公里。这段铁路最初

由安源矿兼管，后由清政府邮传部接受。所有煤焦，由铁路运转株洲后，再用轮船转运，经长沙、岳州至武汉。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取名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二千万元。这样，安源煤矿便成为该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汉冶萍改为完全的商办，萍矿亦同时改组，由李镜澄任矿长，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到一九一七年，安源煤矿日产量增至三千六百吨，比十年前的日产量增加了近两倍，工人增加到一万一千人。

汉冶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安源煤矿是这一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虽然改为“商办”，但它的官僚买办实质并没有改变，整个企业仍然被盛氏买办集团把持着；他们将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向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在这种情况下，安源的工程建设虽粗具规模，日产量虽大有提高，但债台也筑得很高。从建矿以来，它一直是帝国主义攫取资源、榨取利润的角逐场所。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的二十二年中，德、日帝国主义仅在安源一地夺去的优质煤就达一千三百多万吨。

一座人间地狱

安源煤矿兴办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套军警遍布、网罗周密的统治机构。较大的有设在萍乡的“赣西镇守使署”和稍后的“专员公署”，并驻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军队。仅在萍乡矿务局的管辖下，就有矿警队、法庭、监狱等，象一道道枷锁，紧扣在工人的头上。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〇六年，矿局建立了一支三百人的矿警队，一九一六年扩充到九百人，占工人总数十分之一。至于法庭和监狱，更设有种种残酷的刑罚；各封建把头也私设有刑堂、班房，并施用各种土刑具，迫害工人。到了一九二一年，矿局制定的《萍矿工人通守规则》，压迫工人更为狠毒。如规定工人须听从工头和管理人员的指挥，不得违抗；如不服从，轻则扣减工资、记过，重则开除；禁止工人在工作时间谈话，“非奉差遣，不得自由外出”。《守则》还规定凡有所谓“聚众闹事者”，“有不法行为及有意扰乱情事者”，立即开除或送官惩办。对于被开除的工人，则规定永不录用，并不准“改名腾充”。在这样严密监视和残暴统治之下，广大煤矿工人没有半点自由，只能过着任人压榨欺凌的牛马般

的生活。

政治上的压迫，就是为了经济上的剥削。安源煤矿的总工程师、德帝国主义分子赖伦，每月的工资是二千一百二十块银元。他离职后，每年还要领取五千零八十八元的“养休费”。另一矿局官僚王鸿卿，名义上每月工资四百元，实际所得不下三千元。这样的月薪，比一个窿内大工一月的工资要高出三百倍以上。在安源煤矿，从矿长到把头，都象吸血鬼一样，贪婪地吮吸着工人的血汗，而且简直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他们残酷盘剥的手段很多，最主要的有滥发矿票、高抬物价、克扣勒索、重利益剥等方法。例如，窿内大工每月工资七、八元（银元），小工五、六元，但都拿不到现钱，只拿得到矿票、这种矿票虽说与银元同值，但只限在安源矿区内使用，加上矿局的背后操纵，商人的从中渔利，工人实际所得，只有票面价值百分之六十或七十。至于借口“经济困难”，“经济周转不济”而停发、拖欠工人工资的事，更为常见。在安源矿区，是实行工头包工制。凡来矿山作工的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都要经过包工头的招揽，出卖人身自由，才能进入矿山做工。包工头对工人的盘剥手段同样极其狠毒。他们的方法主要是克扣工资。有个工头陈盛芳，在安源当工头十年的克扣所得，就在家乡醴陵买

了大量水田，开了许多店铺，成了有名的大地主兼资本家。工头剥削之多，即此可以概见。

再看看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矿局为了压低生产成本，并下巷道和采掘工作面的通道开掘得又矮又狭，通风、排水设备极差。有的采掘面温度很高，象个“火焰山”，干上一阵就会口里冒烟，眼里冒火。这时工人得赶快跑出来，到巷道旁边的水沟浸上一会，喝几口脏水，不然就会昏倒。有的采掘面则象个“水帘洞”，上面漏水，下面积水，工人在这里挖煤，时间久了，全身被浸得发白发烂。还有那可怕的所谓“闭风区”，工人一不小心，走进这样的地方，就会立即窒息死亡。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天劳动两班倒，工人每次下井，得连续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有的还要打连班，几天不能出矿井。他们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品，只有自备的一块三尺多长的白布，下井缠在头上当矿帽，出井当洗澡布和围腰，大家叫它“三用布”。工人劳动时，口衔小油灯，有的用手镐挖煤，有的用煤箕拖煤，在狭小的巷道里爬来爬去。尤其经过有名的“水巷”三夹槽时，整个身子和煤箕都泡在水里，只有头部浮在水上往前移动，真是惨不忍睹！还有长达四、五百米的陡坡，工人们要顶着二百斤重的煤箕沿着滑梯往坡下滑去，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煤掉下，轻则伤残，重则死亡，

工人管这里叫“摩天岭”、“鬼门关”。至于井下的冒顶、落石、穿水、起火和瓦斯爆炸等事故，更是经常发生，不知有多少工人在这里送了生命。据记载：一九〇五年，东平巷十三段一次瓦斯爆炸，有九十多名工人死亡；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一次井下大火，烧死一百多名工人；一九一七年八月，从直井到东平巷发生大火，有九十多名工人遇难；一九一九年冬，一次井下大火，有八十多名工人死亡；一九二〇年一月，东平巷瓦斯爆炸，三十多名工人死亡。这只是几次较大的火灾和瓦斯爆炸事故。其实，因种种事故而伤亡以及病死累死的工人又何止这些呢？工人们就是这样长期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挣扎，用自己的血汗以至生命，为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创造财富。

至于生活上的痛苦，更不待说了。且看矿局为工人设立的“餐宿处”吧！这里供应的饭，大都是霉得结块发绿的臭米煮成的，里面还夹着沙子；菜呢，冬春多是黄花草，夏秋只是一点东南瓜。至于住的地方，都是竹木搭架、篾折围边、茅草盖顶的工棚。每间长四丈、宽二丈，中间摆上三、四排床，每床有上、中、下三层，由早晚两班工人轮睡，每次得挤满四、五十人。夏天酷热，蚊子臭虫丛集，工人多在外露宿；冬天严寒，工棚有如冰窖，有的工人实在熬不住，只得回到锅炉房

或炼焦炉去“放煎”。所谓“放煎”，即是躺在炉旁地上，胸背交换“煎烤”，以此取暖驱寒。有个老工人在“煎烤”时，破棉袄被火烧着了，因他体弱多病，无力动弹，竟被活活烧死了。工人有病时，矿局不仅不给医药费，还要扣发工资和扣除伙食费。病的时间久了，就被开除，连工棚也不准住。有位锅炉工得了痢血病，就被工头派人用门板抬出工棚，丢到铁路桥下，悲惨地死去。至于因工伤致残的工人，便只有活着沿街讨乞，死后野外抛尸的命运。正如一首民谣所说的：“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安源矿区的开发，虽然给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然而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它带给这些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却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啊！

有压迫就有反抗

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把头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安源工人曾多次自发地同这些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安源工人进行的斗争震动比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一九〇一年，正当义和团高举反帝爱国旗帜，